

乡亲的“大家长”。在宋教授看来，通过抱团的力量，商会能有效提升华人群体在当地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力，保护族群利益不受侵害——晚清时期，潮籍社团派员到码头接应受难劳工，协助苦力维权赎身；近代，面对排华风险，吉隆坡潮汕会馆曾开放场馆收容数百名华人。就在2023年，缅甸潮汕商会还联动我国驻外使领馆，依托本地潮商人脉，成功营救了20余名被困于缅北电诈园区的潮汕籍青年。

在民族危亡的关头，商会的功能更是远超商业范畴，展现了强烈的家国担当——抗战爆发后，东南亚多国潮汕会馆牵头组建南侨总会，在陈嘉庚先生领导下，统筹南洋侨商募资，采购药品、军用物资，经滇缅公路等通道输送回国。泰国著名侨领、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蚁光炎先生，

更是带头抵制日货，创办报纸宣传抗日，最终因此被暗杀。大批潮商子弟投身韩江纵队等抗日武装，海内外商会持续提供经费和后勤支持，践行着“经商不忘报国”的族群底色。据统计，抗战时期华侨捐款总计超过13亿元，侨汇达95亿元以上，占当时中国军费的43%，这些钱款，每一分都浸着血汗与赤诚。

浪潮退去，精神还乡

随着现代银行体系的普及和全球通信技术的发展，侨批和传统商会的历史使命相继完成。那些曾在码头和乡间小路上奔波的身影，连同那些写满思念和牵挂的信纸一同走入了历史。当浪潮退去，还有什么精神留给今天的我们？

下图：揭阳古城进贤门。

“潮汕商会的历史价值，不在于培育了多少富商巨贾，”宋小保教授认为，“而是完成了潮汕乡土乡情向制度化商业信用资本的转化，打造了一套可传承、跨地域、全球化运行的商事伦理与组织模式。这套体系至今仍是全球潮商抱团发展的底层支撑。”

如今，全球各地涌现出许多新的潮汕商会和同乡社团。它们的功能和使命虽已随时代而变，但“敦睦乡谊、共谋发展”的核心宗旨未变。那份根植于血缘地缘的抱团精神，依然是他们联结彼此的最强韧带。而在现代商业社会，源自侨批时代的“信用”精神，同样是潮商最为看重的无形资产。

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所引发的“潮汕热”，像是一场大规模的文化“寻根”。它让几十万年轻人涌入侨批文物馆，了解侨批背后的家国历史；也让从未接触过“写信”这件事的零零后，从一封封泛黄的家书里找到自己的文化根脉。

当年的批局早已远去，但那份“做人一定要有情有义”的精神，却将在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身上延续下去。它存在于每一次家族团聚的欢声笑语中，也存在于全球潮商每一次以诚信达成的商业合作里。历史的载体虽已改变，但精神的内核已然还乡。■

